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释析与 新时代减贫战略展望

郑继承¹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贫困问题研究学术史源远流长, 贫困治理的经济学理论根基深厚。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思想的批判, 构筑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在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贫困治理的制度基础, 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事业, 创造出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伟大奇迹。立足于新时代, 中国由绝对贫困治理转轨到相对贫困治理, 无论是国际社会整体形势的变化, 还是中国贫困治理历史阶段的重大转变, 都诉求着中国引领人类减贫事业实现更大突破。

【关键词】: 反贫困 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912(2021)01-0040-12

贫困是伴随人类社会存在而存在的社会现象, 治理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永恒事业。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西方经济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贫困问题一直是经久不衰的研究焦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资本剥削理论、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然而在贫困理论研究和治贫实践创新如火如荼的今天, 理论界关于马克思贫困思想的研究却十分不足, 更是少有学者将马克思贫困理论置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阔背景之下展开价值功能的发掘。立足当代中国贫困治理所取得的卓越成绩, 从逻辑整体性结构视角阐释马克思贫困理论范式, 从实践探索层面解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的整体架构, 不仅能够科学释析当代中国绝对贫困治理的成功奇迹, 对于新时代中国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学视域下贫困理论演进的学术史考察

面对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 人类社会无时无刻都在努力探索治理模式。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 还是当代西方经济学, 都对贫困理论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 亚当·斯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西尔蒙第等古典经济学家都基于不同视角对贫困理论有所阐释。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看, 威廉·阿瑟·刘易斯、西奥多·舒尔茨、冈纳·缪尔达尔、阿玛蒂亚·森、安格斯·迪顿、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等多位经济学家长期植根于贫困理论研究, 并因贫困理论的重大突破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贫困理论的演进

作者简介: 郑继承(1984-), 男, 湖北秭归人,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副研究员, 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云南远景智库特聘专家, 研究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安全稳定新常态及风险防范研究”(19BKS083); 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项目“习近平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经验及成效研究”(ZX201805)

贫困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贫困观。1776年，人类社会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端时期，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系统阐述了“富国裕民”的核心思想。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并未直接提出贫困研究整体思路，而是通过资本、土地和劳动三要素来阐述财富积累过程中的贫困现象，提出“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1]。言外之意，一旦劳动者的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劳动者陷入贫困境况的概率将会大幅提高，如果这一差距继续恶化还会致使劳动者生命终结。因此，斯密主张通过国民财富增殖与资本积累来创造劳动需求，以此拉动劳动工资增长，推动劳动者工资水平接近或超越社会平均工资，从而摆脱贫困的束缚。

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然而处于社会最底层劳动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未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相应的提升，工业革命的红利并未在工人阶级得到展现，部分劳动工人甚至还出现贫困程度加剧的态势。1798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人口原理》中对贫困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物质生活资料的保障，由于按照几何级数速度增长的人口与按照算数级数速度增长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结构矛盾，必然导致人口过剩和物质生活资料短缺现象^[2]，并将此现象称之为“自然法则”。马尔萨斯根据这一“自然法则”将导致贫困产生的原因归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认为人口的盲目增长必然导致贫困的产生，提出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或鼓励个体节制生育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以此缓解贫困问题。

1817年，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基于劳动者工资制度与劳动人口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来探究贫困的深层次内涵。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了劳动者的市场价值的价格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要受到劳动者生活必需品自然价格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受到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影响。只要劳动者生活必需品自然价格高于劳动力市场价格，必然导致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将会大幅缩减^[3]。虽然表面上劳动者的劳动价格得到一定增长，但劳动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却在降低，生活质量得不到本质性提升，甚至增长的劳动工资难以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生活品质却出现隐形地降低，由此导致劳动者更容易深陷生存资源匮乏的处境。

1819年，西斯蒙第(Sismondi)将贫困问题置于“人本主义”的视域中进行考究，通过考察国家财富分配来解析贫困现象。西斯蒙第认为，国家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不均衡是贫困诞生的根源，由于国家过度注重财富增长，任由资本家发展壮大，导致社会财富分配远远超出自我调节能力范围，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于是贫困、饥饿、饥荒等现象必然越来越深化。西斯蒙第进一步提出国家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中应该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国家政府应该以人道主义价值中立的姿态参与社会事务，二是国家政府应该以仲裁者的身份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同时，西斯蒙第并不主张完全消灭贫困，认为现实社会应该存在一定的差距^[4]。

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了两篇关于贫困问题的文章^[5]，虽然这两篇文章并未将马克思已经建构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运用于经验世界，但完全可以将这两篇文章视为马克思开始关注贫困这一社会现象的开端^[6]。随后，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贫困思想的深刻批判，基于现代性场域与理想性愿景的互动张力视角，从理论层面提出贫困现象的两种样态，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构筑出贫困理论研究的整体架构，开创了贫困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具体来看，马克思基于现代社会视角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英国社会赤贫现象解释的不合理性^[6]、基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内在关系的视角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应对贫困问题策略的无效性^[7]，将贫困理论内在辩证关系表象为社会人的转变，即现实的人与自由的人之间的变换。一方面，由于人的异化致使现实的人转向自由的人；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本质复归致使自由的人转向现实的人。在这封闭的循环场域内，由现象到本质映射出贫困始源、贫困积累与贫困衍生的内生条件。可以看出，马克思贫困理论从现实社会生产活动出发，以生产关系为研究主线，科学地破解了贫困产生的本质根源和贫困深化的隐形因素，探寻到人类社会过程中贫困积累的规律和趋势，为全世界重新认识贫困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面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以马克思贫困理论为指导来解决苏维埃俄国的贫困问题。同时，列宁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贫困治理的探索实践，创造性地对马克思贫困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推动了马克思贫困理论的第一次创新。

综上所述, 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实施对赤贫者的救济行为实质上损害个人财产权, 有违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然法则。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建构的贫困理论与个人自由、财产权有机结合在一起, 摒弃了作为其出发点的个人生命、安全和自由等权利, 贫困理论也被视为市场体系充斥其中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要素。由此, 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贫困观的根源性矛盾, 从现代社会视角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现象, 深刻剖析贫困生成的始源、贫困积累的本质, 形成了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马克思贫困理论。

(二) 西方经济学视角下贫困理论的演进

在西方经济学领域中, 主要以发展经济学家为代表基于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所构建出来的经济学理论。从历史演进来看, 发展经济学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 当时美国通过一系列经济援助和协助重建计划使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国家迅速恢复经济发展。从经济学理论的视角看, “马歇尔计划”完美的实现了战后欧洲经济持续性低迷和美国战后产能过剩的问题, 达到双赢的预期效果。由此, 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学派, 并致力于寻找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原由、制定发展中国家治理贫困的策略、构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理论等三大核心议题研究, 可以说发展经济学是致力于解决人类贫困问题的经济学理论。20 世纪以来, 受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苏联实施的工业化强国战略取得巨大成功, 中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埃及、印度、坦桑尼亚等国家经济发展也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效果。

基于发展经济学的快速发展, 并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家在贫困问题研究领域内创立了一系列著名的理论和模型, 具有代表性的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的“贫困循环积累”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舒尔茨的“贫困经济学”概念、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贫困论”、迪弗洛和克雷默基于“随机对照试验”对减贫实践的创新等。其中, 缪尔达尔、刘易斯和舒尔茨、阿玛蒂亚·森、迪弗洛和克雷默由于对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开创性研究, 分别获得了 1974 年、1979 年、1998 年和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56 年, 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提出贫困“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并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对这一理论做出了系统的阐述。贫困“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可具体概括为: 基于理论推演, 存在一个人均收入的阈值, 只要人均收入低于这一阈值, 国民收入的增长将被更快速度的人口增长所抵消, 从而使人均收入回到仅能维持基本生存水平的状态, 并且保持固定不变; 当人均收入高于这一阈值, 国民收入将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 人均收入将得到相应的增加, 这一增长趋势将持续到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增长实现新的均衡位置, 新的均衡是相对较高水平的均衡^[8]。

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结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冈纳·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提出贫困“循环积累”理论, 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问题。贫困“循环积累”理论指出: 发展中国家由于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导致生活质量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全社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也就相对较低, 导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 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将必然引起产出增长停滞甚至下降, 产出放缓或下降必然再一次引起收入下降, 如此循环反复, 致使发展中国家一直陷入低收入的累积性循环困境之中, 如果没有强力的外部刺激, 这种循环均衡很难打破^[9]。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和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 研究领域均为农村发展理论。舒尔茨(1943)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的系统研究, 将“贫困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并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制度建设和供求管理两个方面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条件, 强化对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 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10]。刘易斯(1955)因“二元经济”理论而轰动理论界, 这一理论也常被用以解释贫困现象^[11]。这一时期, 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理论在贫困研究领域内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从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阐释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演化过程^[12]。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权利贫困论”的概念, 运用“权利方法”研究贫困、饥饿问

题,进一步拓宽了贫困理论研究的视野^[13]。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贫困与饥荒》和《饥饿与公共行为》中,认为贫困、饥饿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穷人“权利丧失”,穷人之所以穷主要是因为穷人丧失了四方面的权利,即以交换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将自己的商品与他人交换)、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将自己的资源或雇用来的要素用于生产)、以自身劳动力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将自己的劳动力用于自己组织的生产或受雇于他人)、以继承或转让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继承财产或接受赠予)。穷人丧失以交换为基础的权利和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贫困的根本原因;穷人丧失以自身劳动力为基础的权利和以继承或转让为基础的权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贫困的根本原因。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均为发展经济学家,通过将“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简称RCT)引入贫困理论研究,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解释贫困问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贫困理论问题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14]。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以RCT为核心的实验经济学创造性地将宏观维度的贫困问题分解成一系列微观维度的具体问题,运用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等方法,通过小范围独立实验对这些具体的微观问题进行研究,由此制定出解决这些影响中某一个微观问题的方案,形成减贫方案的集合^[15]。可以看出,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许多研究成果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治贫政策,且在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诸如,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克雷默者关于驱虫对适龄儿童健康和学业影响的研究成果,建议利用大规模驱虫方式改善儿童健康和营养^[16]。班纳吉和迪弗洛关于教师与学生水平匹配对学生学业影响的研究结论,推动发展中国家教育部门改变了传统的按学生年龄段分班的做法,实施按照学生学业水平的方法来分班教学,这项政策在印度和非洲的6000万学生中实施^[17]。

(三)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问题的研究回顾

国内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下,我国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仇启华^[18]、蒋学模^[19]、陆立军^[20]等针对马克思贫困理论中的“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尤其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一系列新变化,运用马克思贫困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了系统性阐释。同时,我国早期的经济学家还从马克思贫困理论的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战略思路,并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经济发展的重大思路,诸如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

1978年,改革开放战略将中国推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显著,贫富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学术界基于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深刻理解和科学认识,开始研究城乡发展差距的问题。这一时期,中国贫困理论问题的研究开始从“资源制约贫困说”^[21]与“素质能力贫困说”^[22]向“系统性贫困说”^[23]转变,多维贫困的研究视角开始形成,中国贫困理论的研究开始进入正轨。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时开创性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并将贫困治理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推动了人类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基于此背景,贫困问题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理论界从不同的学科门类对贫困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基于当代中国贫困理论研究成果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贫困理论研究的重点主要聚焦在六大方面:第一,关于马克思贫困理论与当代中国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中国反贫困理论起源于马克思贫困理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贫困理论为指导来治理中国贫困问题,并在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是当代中国对马克思贫困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田超伟,2018;吴国宝,2018;黄承伟,2020)^[24-26]。第二,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论述的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扶贫开发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开创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实现了马克思贫困理论中国化的伟大飞跃。(刘永富,2018;万建武,2020)^[27-28]。第三,关于中国特色反贫困政策体系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开发经历了救济式、制度式、开发式、精准式四个阶段,基于各个阶段的发展态势,国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政策,由此形成中国特色反贫困政策体系(汪三贵,2010;王超、刘俊霞,2018)^[29-30]。第四,关于中国特色反贫困路径与模式的研究。中国在70多年的扶贫开发过程中,探索出产业扶贫、生态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科技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贫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路径(陈劲、尹西明、赵闯,2018;王昉、王晓

博, 2020)^[31-32]。第五, 关于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建构的研究。中国反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为人类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然而中国贫困理论的创新远远落后于贫困实践创新,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贫困理论创新的使命(闫坤、刘轶芳, 2016; 黄承伟, 2019; 李正图, 2020)^[33-35]。第六, 关于新时代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研究。2020年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后, 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治理相对贫困问题, 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将成为新时代贫困治理的核心内容(邢成举、李小云, 2019; 郑继承, 2020)^[36-37]。除此之外, 还有部分学者从其他实践对贫困问题展开研究, 诸如中国特大城市居民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张文宏、苏迪, 2020)^[38]、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接续问题(岳国芳, 2020)^[39]。

二、当今世界贫困理论发展的局限与困惑

放眼当今世界, 摆脱贫困依然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人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仍然是减轻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然而, 当今世界贫困理论发展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尤其是随着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走向纯粹经济学, 数量化、模型化分析越来越成为主流, 所关注的重心转移到财富积累, 对贫困积累越来越弱化, 导致贫困理论研究的视角越走越窄, 无与伦比的数学模型对现实贫困问题却毫无解释力。

从西方经济学贫困理论发展来看, 发展经济学由“神坛”走向衰落标志着西方贫困理论的发展也走向死胡同。上世纪80年代,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西尔斯教授最先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已经被证明远远没有它生气勃勃的年轻时期所乐观地期望的那么有活力”^[40]。随后, 经济学界开始否定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甚至质疑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学科, 由此对发展经济学做出“走下坡路”“衰落”“进入收益递减阶段”“已濒于死亡”等悲观论断。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在耶鲁大学第25届发展经济学年会上也不得不承认“大家公认发展经济学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 在80年代和90年代, 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应用的障碍都可能超过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是英国伦敦大学狄帕克·拉尔教授在《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中直接批评纳克斯、赫希曼、钱纳里、刘易斯、缪尔达尔等一大批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 指出他们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灾难, 并得出了令所有发展经济学家都极为沮丧的结论“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很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的同时兴旺。”^[41]为挽救发展经济学的命运,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开始探究发展经济学由繁荣走向衰落的缘由。他们将发展经济学衰落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发展经济学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强烈排斥, 二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两个方面的解释都不失其道理, 但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 发展经济学理论不能得到现实社会的验证, 且发展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社会的实践没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虽然, 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三位发展经济学家因减贫理论的创新而获得经济学的最高荣誉, 但仍然不能给发展经济学发展带来光明的未来。其一,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贫困问题的; 其二, 考察减贫理论成功与否更重要的是对治贫效果的检验; 其三, 离开了政府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可以说, 以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发展经济学, 并没有很好的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也未能很好的解决发展中国家迫在眉睫的贫困问题, 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42]。立足当代, 发展经济学需要以更大的理论创新才能摆脱当前的局限与困境。

从政治经济学的贫困理论发展来看, 贫困理论发展显然滞后于治贫实践。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从一个全域性贫穷的国家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新时代的中国正在无限靠近世界舞台中央。70多年时间来, 尽管当代中国已经初步建构出独具中国风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 尽管中国的贫困治理已经取得了世界公认的瞩目成就, 但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贫困理论发展却远远落后于治贫实践。具体而言, 新中国70多年治贫实践历程中, 不仅开创性地提出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治贫策略, 还在治贫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²⁾。正是基于贫困治理实践的探索性创新, 当代中国减贫事业才取得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然而, 从理论维度来观视中国反贫困事业, 尽管中国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创造出许多新方法、新模式, 这些实践却始终未能上升为反贫困理论的创新。换言之, 当代中国反贫困事业正面临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结构性矛盾, 即“实践创新超前于理论发展, 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创新”, 这一态势必然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所遵循的“理论指导实践, 实践丰富理论”战略导向构成强约束。2020年中国已经全面终结绝对贫困进入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 面对相对贫困治理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 当前零散碎片化的贫困理论很难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发挥作用, 贫困理论创新与治贫实践创新的结构性矛盾将会更加凸显。立足于当下, 无论是国际社会时代特征的

变化、国内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还是中国贫困治理历史阶段性转轨，都诉求着中国在贫困理论层面的重大突破，为人类减贫事业贡献中国理论。

三、中国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的逻辑进路

马克思将贫困划分为绝对与相对两种样态。无论是具有静态特征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种形式，还是具有动态演进的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两类趋势，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都得到了充分印证，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实践的验证。正是基于马克思贫困理论的科学性指导和中国治贫方略的创造性实践，2020年中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提前十年实现减贫领域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出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

(一) 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的绝对贫困治理

马克思贫困理论认为，无产阶级要推翻压迫、消灭贫困，只能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基础，绝对是一个以落后农业生产为核心的极端贫穷国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贫困理论付诸于中国革命实践，在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下坚定不移地探索社会主义治贫之道。

第一，推翻旧制度下的“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系统研究马克思贫困理论之后，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和劳苦大众的贫困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虽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中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已经基本解体，但封建社会的剥削现象仍然存在，地主阶级仍然采取占有大量土地资源实施对农民的剥削，统治中国的主体仍然是地主阶级、军阀官僚和大资产阶级三大群体，为社会创造大量财富的农民却仍然身处赤贫境况。在毛泽东看来，旧中国的贫困根源是来自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肆掠夺，导致“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43]由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贫困问题主要由已被推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造成”^[44]，认为中国只能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贫困问题。1953年至1956年，通过土地改革、实施农业合作化、加强农民素质教育、推广农业技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缓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全域性贫困问题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基本制度基础^[45]。

第二，破除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解放和提高生产力。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是消灭剥削、消除贫困的首要前提，具体表现为废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强占的特权、废除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垄断的资本所有权^[46]。即使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生产关系是中国消灭剥削、消除贫困的根本前提”的基本原则。1963年底，毛泽东提出通过科学技术来提高国家生产力，进而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47]。

总体来看，1949年到1978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探索中，尽管未能形成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发展的系统性扶持措施，也没有形成基于国家治理维度的反贫困体制机制，但将这个阶段置于当代中国减贫史的全域视角来观视，这一段贫困治理历程依然是中国贫困治理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48]。尤其是土地改革的完成，全国3亿农村居民共分得7亿亩土地，中国粮食总产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30477万吨^[49]，对于一个以农业和农村居民为主体的贫困国家而言，直接缓解了广大农村居民生存性贫困问题。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绝对贫困治理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贫困问题。然而，列宁在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初期仍然存在贫困问题。就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改造”仅仅只是消除了导致贫困的制度性因素，并不意味着消除贫穷本身，应该客观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贫困现象。基于此，邓小平提出“贫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由此中国开启了阶段治贫的探索。

第一，“三步走”与“两个大局”战略构架下的贫困治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新征程，并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层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基于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综合考虑中国贫困治理事业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反贫困事业制定出“四个现代化”的小康社会目标^[50]，这一战略经过党的十二大与十三大的深化，最终确定为由解决温饱、实现小康、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组合而成的梯次上升的“三步走”战略^[51]。1988年，邓小平基于“三步走”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出内陆地区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与沿海地区反哺内陆地区的“两个大局”重大论断^[52]，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治贫的整体构架，并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得到纵深推进。

第二，人民群众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过程中再次谈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时，指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发展与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思想，人民群众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主要途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53]。这一重大论述始终贯穿于中国贫困治理的整个历史进程，指导着中国彻底摆脱了温饱问题，推动了贫困地区走向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

总体来看，1978年到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专门设立了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的组织机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科学划定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83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梯度出台了三轮扶贫开发专项规划⁽³⁾，国家扶贫瞄准单元由集中连片到贫困县再到贫困村。基于扶贫政策的持续性推进，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1年的7393.9元⁽⁴⁾，基本解决了农村居民的温饱问题，为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供了现实条件。

表1 1978~2011年我国贫困基本情况

年份	贫困人口(万人)	贫困发生率(%)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1978	25000	30.7	133.6
1980	22000	26.8	191.3
1985	12500	14.8	397.6
1990	8500	9.4	686.3
1995	6540	7.1	1577.7
2000	3209(9422)	3.5(10.2)	2282.1
2005	6432	6.8	3370.2
2010	2688(16567)	2.8(17.2)	6272.4
2011	12238	12.7	7393.9

注：(1)我国先后四次对贫困标准进行了调整：1984年，贫困标准确定为每人每年200元；2000年，贫困标准确定为每人每年865元；2008年，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整合为贫困标准每人每年1196元；2010年，贫困标准确定为每人每年2300元。(2)按照1984年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末的2.5亿人减少到1985年末的1.25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末的30.7%下降到1985年末的14.8%。如果按照2010年价格确定的每人每年2300元的贫困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末的7.7亿人减少到1985年末的6.6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末的97.5%下降到1985年末的78.3%。(3)本表中的数据是按照1984年的标准来测算，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发布的数据。括号内的数据是按照上一期标准的统计值。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绝对贫困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贫困治理事业也迈向新征程。站在历史的新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就扶贫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阐明了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54]。

第一，治贫理念更加注重内生动力的培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立足于贫困治理形势的新变化，改变传统单向性的物质帮扶机制，更加注重对“人”的改造和素质的提升，坚持“治贫先治愚、扶贫与扶志并重”的思维导向，注重培育贫困群体的发展意识，帮助贫困群体由被动转向主动、由客体转变为主体，实现对贫困群众从外部帮扶向自我发展的重大转变。

第二，治贫方式更加注重多维审视与综合施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改变传统将贫困简单地看作收入型贫困和支出型贫困所形成的物质性扶持的线性思维，更加注重对贫困群体致贫原因的多维审视，多角度分析、多渠道帮扶，在帮助贫困群体摆脱物质贫困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贫困群体的教育质量、健康水平和就业效益^[55]，推动贫困群体摆脱精神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

第三，治贫战略更加注重整体性与系统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更加注重从宏观维度治理贫困，建构出以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支撑的大扶贫格局。从顶层设计来看，国家先后制定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战略，形成了国家大扶贫格局的宏观战略指导。从体制机制来看，搭建起中央、省(自治区)、市(自治州)、县(区)、乡(街道)系统化管理结构，形成“五级联动”和“三大帮扶”的主体模式⁽⁵⁾。从责任主体来看，中国贫困治理探索出“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成为治贫成效的坚强保证。

第四，治贫路径更加注重治理模式多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始终坚持开发式扶贫和保障式扶贫相结合的模式，系统布局“五个一批”工程，开创性探索出网络扶贫、科技扶贫、资产收益扶贫、消费扶贫等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帮扶路径，拓宽了贫困群体增收的有效渠道，为贫困群体脱贫稳定脱贫和发展致富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这一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指导着中国创造人类反贫困史的奇迹。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总结各个历史阶段扶贫开发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贫模式，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大扶贫格局。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了动态清零，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长期以来阻挠中国发展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

表 2 2012~2019 年我国贫困基本情况

年份	贫困人口(万人)	贫困发生率(%)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2012	9899	10.2	8389.3
2013	8249	8.5	9429.6
2014	7017	7.2	10488.9
2015	5575	5.7	11421.7
2016	4335	4.5	12363.4
2017	3046	3.1	13432.4
2018	1660	1.7	14617

2019	551	0.6	16021
2020	动态清零		—

四、新时代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战略思考

立足于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都诉求着中国在贫困理论层面的重大突破，为人类减贫事业贡献中国理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围绕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问题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和“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大论述，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相对贫困治理作出重大部署。面对贫困治理的质态转轨，如何认识相对贫困治理的时代特征、如何制定相对贫困的治理策略、如何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将是当前贫困治理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需求

中国减贫事业已经进入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将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首要任务，缓解社会主要矛盾仍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将成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价值追求。

第一，如何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首要任务。基于绝对贫困治理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绩，相对贫困治理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这一伟大成果。对于刚刚脱离生存需求的贫困群体，尽管已经具备一定的发展能力，但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还相对较弱。一旦遭遇外部冲击(诸如，灾害侵袭、疾病来临等)，定然再次陷入贫困状态。因此，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四个不摘”的过渡性思路^⑥，需要在相对贫困治理初期设置一个过渡性阶段，保持扶持政策的延续性、帮扶措施的持续性，避免贫困人口再次跌入绝对贫困的“陷阱”。

第二，如何缓解社会主要矛盾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党的十九大客观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预见，人民群众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短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仍然是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发展，进而缓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第三，如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是相对贫困治理的价值追求。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带领人民群众与贫困顽强斗争，其核心目的是让人民群众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人民群众将彻底解决生存性问题，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资料和精神满足，相对贫困治理将为实现人民群众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资料和精神满足创造实现条件。

(二)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战略思考

立足于相对贫困所具有的隐蔽性、差异性、长期性、动态性等特征，直面相对贫困治理的新态势，新时代中国相对贫困的治理思路也将面临重大调整。

第一，始终坚持党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全面领导。我国之所以能够在取得绝对贫困治理的伟大成绩，其核心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0多年来，党中央围绕贫困地区全面脱贫的各项工作、各个环节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举措，有效推动了我国贫困治理能力的大幅提升和治理手段的现代化发展，为贫困地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证。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后，更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大地发挥党中央在治理相对贫困问题中统揽全局的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基础作用，为贫困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政治担当。

第二，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绝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56]绝对贫困治理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脱贫攻坚的战略路线图，并出台了一系列脱贫攻坚的政策举措，成为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政治保障。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家相关部门围绕扶贫开发出台的政策措施超过 200 项。新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该继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通过创新性制度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推动人类减贫事业迈上新台阶。

第三，合理设定绝对贫困转轨相对贫困的过渡阶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57]的过渡性思路，在绝对贫困治理转轨到相对贫困治理的初期，需要设定一个过渡性阶段。由于这个过渡性时期内既包含绝对贫困的基本属性(诸如返贫、新生贫困等问题)，又具有相对贫困的基本特征(诸如偏低的居民收入与高质量的生活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治理方式既不能完全照搬现有的绝对贫困治理模式，也不能全盘沿用相对贫困治理策略，应该统筹考虑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共同特征，确保贫困治理理论指导的统一性、瞄准识别的一致性、战略目标的渐进性，注重前置政策和后续政策的接续性，推进绝对贫困治理阶段顺利转轨到相对贫困治理阶段。

第四，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协同关系。有机整合政府、社会、市场三方面的资源，发挥有为的政府作用、有效的市场活力和积极的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促进”的有机整体^[58]。基于政府层面，继续发挥高效的主导性作用，进一步强化战略引领、机制创新和监督评价三大作用；基于社会层面，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相对贫困治理，激发第三次分配的活力；基于市场层面，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优势，进一步拓宽贫困个体参与市场的空间。

第五，科学推进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在中国绝对贫困治理阶段转轨至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审时度势地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9]，为新时代中国相对贫困治理指明了方向。可以看出，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交汇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一方面，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对脱贫攻坚进行再思考，研究如何利用乡村振兴战略所明确的政策措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基于相对贫困的新态势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再认识，研究相对贫困治理对乡村振兴的动力传导机制，形成贫困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活力。

五、结论与展望

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贫困理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构建出人类消解贫困的理论范式。^[60]立足当下，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在人类减贫事业上探索出来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开创了发展中国家治理贫困的新篇章，为人类减贫事业提供了全新的方案。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盛赞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时指出一样“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61]可以说，中国贫困治理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全球如期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坚定了信心，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为发展中国家摆脱绝对贫困打开了全新的治理模式。

反思今天中国减贫所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中国人民的奋斗创造。中国用理论推动了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创新，中国用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减贫事业上的优越性。有理由相信，在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反贫困事业必将取得决定性胜利。

参考文献:

- [1][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35.
- [2][英]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M]. 朱泱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113.

-
- [3][英]彼罗·斯拉法.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88.
- [4][法]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M]. 胡尧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133.
- [5]Lubasz, H. Marx's Initial Problematic: The Problem of Poverty[J]. Political Studies, 2006 (01):24-42.
- [6]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473.
- [7]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420.
- [8][美]理查德·R·纳尔逊. 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 [9][瑞典]冈纳·缪尔达尔. 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M]. 谭力文、张卫东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2.
- [10][美]西奥多·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 [11]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Manchester School, 2010, 22(2):139-191.
- [12][美]罗格纳·纳克斯. 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M]. 谨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6.
- [13][印度]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M]. 王宇、王文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 [14][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 埃斯特·迪弗洛著.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M]. 景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8.
- [15]李宝良, 郭其友. 因果关系的实地实验与新实证发展经济学的贫困治理之道——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要经济理论贡献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9(11).
- [16]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建议利用大规模驱虫方式改善儿童健康和营养[EB/OL]. (2017-09-29). <https://apps.who.int/mediacentre/news/releases/2017/large-scale-deworming/zh/index.html>.
- [17]Banerjee A, Banerji R, Berry J, Duflo E, Kannan H, Mukherji S, Shotland M, Walton M. Mainstreaming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Evaluations of "Teaching at the Right Level" in India[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
- [18]仇启华, 解德沅, 黄苏. 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与实际[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19]蒋学模. 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几点看法[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2(04).
- [20]陆立军.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只是“有时出现的现象”吗?[J]. 开封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79(04).
- [21]姜德华. 中国的贫困地区类型及开发[M].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1989.

-
- [22]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56.
- [23]夏英.贫困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4]田超伟.马克思贫困理论及对新时代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实践价值[J].东南学术,2018(03).
- [25]吴国宝.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成就及经验[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
- [26]黄承伟.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贫困问题[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30-34.
- [27]刘永富.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形成过程、科学内涵及历史贡献[J].行政管理改革,2018(09).
- [28]万建武.走新时代共同富裕道路的成功实践与创新发展——习近平扶贫论述的重大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03).
- [29]汪三贵.中国特色反贫困之路与政策取向[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04).
- [30]王超,刘俊霞.中国反贫困工作40年历史演进——基于1979~2018中国反贫困政策的量化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
- [31]陈劲,尹西明,赵闯.反贫困创新的理论基础、路径模型与中国经验[J].天津社会科学,2018(04).
- [32]王昉,王晓博.新中国70年反贫困思想的演进路径与逻辑架构——基于政策文件的文本对比研究[J].经济学家,2020(02).
- [33]闫坤,刘轶芳.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34]黄承伟.论中国新时代扶贫理论实践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1).
- [35]李正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制度和道路述论[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1).
- [36]邢成举,李小云.相对贫困与新时代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J].改革,2019(12).
- [37]郑继承.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经济学家,2020(05).
- [38]张文宏,苏迪.特大城市居民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03).
- [39]岳国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构建[J].经济问题,2020(08).
- [40]Seers.D.The Birth,Life and Death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Development and Change[J].1979(10):24-37.
- [41][英]狄帕克·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M].刘沪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3.

-
- [42]周文, 郑继承. 减贫实践的中国贡献与经济学诺奖的迷误[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04).
-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631.
- [44]毛泽东选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117.
- [45]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助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20.
- [46]毛泽东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176.
- [47]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351.
- [48]李小云. 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0).
- [49]“中国号”经济巨轮稳健前行[N]. 人民日报, 2019-09-25(02).
- [50]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37.
- [51]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56.
-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77-278.
-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70.
- [54]郑继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的伟大实践[J]. 开发性金融研究, 2020(02).
- [55]郑继承. 中国健康扶贫的逻辑演进与新时代战略转型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05).
- [56]习近平.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3-07(02).
- [57]习近平.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3-07(02).
- [58]王思斌. 全面小康社会初期的相对贫困及其发展型治理[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5).
- [5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 人民日报, 2020-11-04(03).
- [60]郑继承. 批判与建构:马克思贫困理论的逻辑理路与辩证图景[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06).
- [61]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N]. 光明日报, 2019-08-13(02).

注释:

1 第一篇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于 1841 年 6 月 15 日至 17 日刊发;第二篇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于 1843 年 1 月 15 至 20 日刊发。

2 这些有效模式包括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金融扶贫、生态扶贫、消费扶贫、就业扶贫、文化扶贫、消费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和东西部扶贫协作等。

3 三个重量级的扶贫开发专项规划分别是:1994 年出台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2001 年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和 2011 年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4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8 月 12 日公开发布的《扶贫开发持续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整理得到。

5 级联动,即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级职能部门、地方政府领导班子、驻村扶贫工作队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三大帮扶,即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帮扶、社会力量协助。

6 “四个不摘”即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2019 年 4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四个不摘”的思路,2020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四个不摘”的思路。